

宋詞與封建士人心態管窺

曹 成 龍*

<目 次

- | | |
|----------------|-------------|
| I. 忧患心态 | III. “出世”心理 |
| II. 求知之难与感相知之切 | |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动向,即古代文人心态的研究。这一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最早发表这方面文章的有刘毓庆、王立、尚永亮等先生。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常常只关注到历史背景、作家身世及社会生活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几乎没有考虑到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之间,还存在着一片空地,这就是文人心态。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从心态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有的专著、论文即以“心态”为名。“心态”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概念,它是人的心灵世界中那些情感的、情绪的、意志的、思想的整合体,它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意识与无意识的不同精神层面,是生动活泼的,人的欲望、情志和意念都涵盖于其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心态是一个统一体、整合体,一个人的心态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一个特定的境遇下,往往有着相对的稳定。心态不仅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心态,一个时代亦有属于这一时代的普遍性心态。通过对一个时代文人群体作品的考察,是不难发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遍心态的。而通过众多个体心态而考察得出

* 黑龙江大学 教授

的对时代性的文人心态的认识,是个体心态的集约化与升华,也是洞照时代精神的中介。

围绕中国封建社会士人心态问题,可以突出词内容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道与势、求知与感知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封建士人沉忧积愤情结的所在。这种情结被发抒在各种文载中,宋词内容的不断开阔,形式的不断创新,更为抒发词人心态、情结创造了条件,掌握了这种集结,就可以更深层地发掘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层意义。

文学的外部环境只有作用于文人心灵,才能引起文学的产生与变化。文人心态正是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的中介,文人心态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与艺术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十几年里,研究者在探索文人心态的过程中,解释着文学史上的一个个疑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量研究论文与著作的出现兆示着文人心态研究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文人心态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开拓还远远不够。

研究封建士人心态,要研究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和生活情趣,也要研究他们人性的张扬与泯灭。我们认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士人心态的主要方面是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各种思潮。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并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而思想潮流在进入封建士人的内心,变成其人生取向,融入他们的感情世界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除此之外,现实的生活状况、家庭的文化传统、社党的组合与交往,婚姻状况以及个性等也是影响封建士人心态变化的一大因素。

在中国百花竞妍的诗歌园地中,宋词是一束瑰丽的花朵。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欣赏宋词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不但是宋词的根本,而且是其内容的主导。词发展到宋代,内容格式不断扩大、更新,代表先驱有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等。纵观宋词的内容,北宋词坛始终是婉约词派的天下。内容多为男欢女爱,男别女恨。因而多为缱绻缠绵,粉香脂红。南宋词坛的突出特点即家仇国恨。南渡词人的大量出现,他们或抒发不得施展政治抱负的郁闷,或抒发家破人亡、国家四分五裂的悲痛,多慷慨激昂,可见“诗言志”

的道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宋朝的历史特点。宋时社会生产力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特别是宋代的城市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宋代均已高度成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从前，对外态势也由攻势渐转为守势，直至被外族灭亡。而在国内，统治集团追求享乐的腐朽性本质，以及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病，至此亦暴露得更加分明。这些情况都预示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这无疑又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矛盾：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提高，社会的高度发展与成熟，人们的感情生活也日臻繁复细腻，因而人情与人性的表现空前地活跃和饱满；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深化，人们的苦闷和烦恼也越来越多，对于人生的思索和探索也越发加深。因此，在宋代士人的心理面貌上也出现了这样矛盾的状态。时而为世俗生活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满足，时而又感到颓废与感伤，对人生世相的悲哀也感觉良多。因而，作为抒情特别细腻深刻、韵致宛转轻柔的词自然成为广大文人作者充分利用的文学工具了。

总体说来，困扰宋词创作士人心灵的问题表现在政治权力与学术文化的矛盾、求知之难和感相知之切等方面。下面分别作以简析：

I. 忧患心态

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的独特风貌，植根于宋代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换言之，宋代文学的璀璨不过是宋代历史条件下文化兴盛的一个表征。一如发生在文学领域的豹变，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和以张载、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道家的反观

内省，禅宗的妙语机锋，则从不同的方面引发了文人的兴致，开扩了人们的思理。这种种因素，陶钧出宋代文学尚理的特点。

从社会结构上看，随着宋代门阀制度和观念进一步削弱，寒门士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提高。而朝廷在政策上向文治倾斜，文化上比较开放，教育显示出普及化、平民化趋向，科举取士限制势家特权，开放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对贫寒士子应试经济上给予补贴，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也比唐代大幅度增加，使寒门人士有更多机会走入仕途、跻身文林。更重要的是，赵宋自立国之初便面临严重的内外交困，在这种氛围中，士人之间普遍地形成了至今仍为人称道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天下、体国恤民的襟怀不时流露在士人的著述和吟唱之中。而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机会，则积极建言献策，以图变革自强。

文学是欢乐与苦闷的象征，试着翻开唐宋词的文学史册，几乎到处都可以读到那些或香艳、或凄丽、或热烈、或怨悱的爱情词篇。其时代特色与文体特色带着城市的色彩，既恣放也细腻。虽然如此，宋词中也存在着大量词作，表现出了宋人的苦闷。

纳兰性德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饮水诗·填词》）揭示了词与忧患心理间的密切关系。宋代词人，既承受着前代文学中积淀本已十分丰厚的忧患心理的精神负担，又吸收了宋朝社会中新的忧患心理的精神势能，忧患情绪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词人的心头。这种忧患心理来自于文学本身的继承，继承了前代以悲为美的传统，也接受了来自于宋时期的社会境况。作为最敏感的社会阶层，面对两宋这个国力大不如往昔、积弱积贫相当严重的社会现实，宋代士人们“多愁善感”、“深思”的心理气质通过宋词充分地表露出来。宋代社会中所产生和潜伏着的矛盾与危机，也通过这些士人敏锐地反映出来。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词中所表现出的忧患心理，又主要集中到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关注与忧虑上。辛派爱国词就突出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辛弃疾词《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

犹如此。”这几句令每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读后都会动容变色。刘克庄词：“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难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沁园春》）又会使每一个旧时代的士人读后扼腕长叹。这些忧患于政治、忧患于时局，忧患于民族前途的爱国词作，体现着宋代词人对于历史的高度责任感。

李清照生活在民族危急十分严重的时代，金人的疯狂入侵、宋室的退败南渡，直接破坏了她宁静温暖的生活。南渡后的第二年赵明诚病逝，国破家亡的痛楚，使她此时的创作大都笼罩上了一层十分孤独凄楚的感情。如《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整首词象一只失伴的孤雁发出的凄凉哀鸣，寄托了她对亡夫的深挚感情与凄楚的哀思。一句“吹箫人去玉楼空，断肠与谁同倚”。道出了国破家亡后的词人，在茫茫尘世中孑然一身，纵然肝肠寸断，又向谁诉说的哀痛。而“一枝折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寄”，表面上不如“肝肠寸断与谁同倚”那样痛绝，实际上却痛得更深、更久、更远。又如《永遇乐·落日熔金》，这是李清照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作品，写她在一次元宵节时的感受。虽然有“酒朋诗侣”用“香车宝马”来邀请她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词的下片反衬出词人伤感孤凄的心境。刻画出词人对中原沦丧的哀痛，透露出词人对偏安一隅现实的不满。

II. 求知之難與感相知之切

对政治权利的依附和追求，是历代大多数文人终生不渝的人生目标。不幸的是，能够实现这种人生目标文人毕竟是极少数，历代大多数文人都被无情地摈弃在官僚阶层之外，使他们欲依附而不可得。专制历史阉割了许多文人，使他们在心理上成为弱者：既缺乏独立谋生的勇气和手段，又盼不来命运的青睐，在心理上总是期盼与失落并存，自傲与颓放同在。

失落感是一种宽泛的心态，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身上触发这种感情的因素是不同的。达观的苏东坡在秋夜的赤壁之下，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空明中，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更有多少怀着投笔之志的英雄，在这个沙场点兵的季节，因报国无门而抚剑沉吟。凡此种种都可以归结成一种理想与现实不能调和的深层矛盾。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一切热烈的追求，对理想的信仰几乎全部建立在儒家信条之上，因而他们的人生哲学与现实不尽协调，从而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他们常常是一厢情愿地为人欢乐为人愁，因而就不免被对方的冷淡弄得不知所措。正是理想的失落触发了他们对许多事物的怀疑和感伤上。这一点也体现在宋词人求知之难和感相知之切方面。

北宋词人晏殊虽然身为宰相，青云得意，但是在其生活中，也常有着淡淡的愁。况且在他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也曾受到过冤屈，所以他的心中也常常愤懑不平，这种心情在他的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和《山亭柳》（家住西秦）中反映出来。《山亭柳》充满沉痛的求知之感，从广义上说，它说出了千百年来贤士怀才不遇的愤激心情，等于一首“感士不遇赋”。同样，晏殊之子晏几道也有寥落之感，他的《临江仙》，正是欲求知音心情的表露。

苏轼脍炙人口的名篇《水调歌头》中的名句“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既是念君，又是怨君，既是求知，又怨其不知。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精神痛苦，抑郁苦闷，但却又“起舞弄影”，处之以达观的态度。他作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篇，用孤鸿自喻，“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苏轼还有诗云“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好一个“幽人”，似真似幻，如云缥缈，可见其凄清，幽寂、孤独、高洁的身心，“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两句正是苏轼的明心见志：不管多少失意，多少忧患，我也决不违初衷，绝不屈从于人。整篇醒目的“孤”字突出了作者高洁的心胸，抒发了“有恨无人省”之叹。再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

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意象清隽，托意高远，隐约地抒写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抑郁情怀。

词在唐宋时代，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文艺。词的兴起和繁荣，都与歌妓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词与歌妓的关系，是词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宋代的许多词人，官场仕途生活中遇不到知音，就把敏感的触角伸向歌楼妓院，寻其“红颜知己”。贺铸的名篇《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用“美人”可望而不可及比喻理想不能实现，词中他把抽象的闲情化为可感可知的“烟草”、“飞絮”与“雨”，形象、真切地表现出词人失意、迷茫、凄苦的内心世界。柳永的《雨霖铃》：“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凄清哽咽的男女分别，然而这种与红颜知己的离愁别恨，又怎样表述？言有尽而意无穷。

再一个例子就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弱冠之年，即已举兵抗金，杀敌归朝，曾经屡次向朝廷陈恢复中原之大计，却受到歧视与压制，一直未得重用，无惑之年写出感相知的名篇《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上半阙借伤春叹南宋国势之微弱，下半阙借汉武帝与陈皇后故事发抒其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感慨，风格刚柔兼备，可称为宋词中的《离骚》。忧国忧民、脉脉此情谁诉？老年时又作《鹧鸪天》追念少年事，叹岁月蹉跎，隐居田园的无可奈何，极悲愤，又极委婉，充分表达了感士不遇的心情。我们再来看看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上阙忆南郑的生活情景，下阙写如今成都的情况。“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也道出“怀才不遇”的感叹。末句“早知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可以说是绝望的愤激之语。论词的造诣，陆游不及辛弃疾。但遭人排挤，怀抱恢复中原之壮志而又苦于不得施展的痛苦境遇，则与辛弃疾完全相同。

再举一首吴文英的《祝英台近》（除夜立春）：“可怜千点吴霜，寒销

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作夜立春抒发幽闷的胸怀，“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将守岁等待新春到来的人们与苦之守岁的自己相对照，深深怀其所爱之人，正如岳飞《小重山》中的名句“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曲高和寡，有谁能和吾同路，有谁深知吾心？

III. “出世”心理

纵观唐宋词坛，尽管有不少篇章描写了词人所过的奢侈的享乐生活，表现了他们快活与满足的心理，特别是宋代立国之初，宋太祖就曾经号召大家“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结果这一政治导向正逢宋代商业大潮的勃兴，加上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汴梁和临安人口都超过了百万，此外，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还有46个，超过二十万的有6个）、不禁夜市、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的繁荣。但从本质上看，一方面反映了剥削阶级的腐朽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封建社会的衰败。相比之下，宋词与盛唐时期诗歌相比，远远缺乏理想主义色彩和英雄形象，缺乏恢宏昂扬的气势，更多平庸的意念与侧艳靡软的风格，这些都与宋词人怀有的享乐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

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变化，有一部分词人产生了“出世”的心理。北宋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危机加深，政治斗争加剧，所以那种看穿人世的“出世”思想，就在词人的内心里袅袅升起。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中秋词作，主旨在于抒发作者外放无依的茕独情怀。词中杂用道家思想，观照世界，并且自为排遣。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厌憎险恶的宦海风涛，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词人运用直接描绘的手法，勾勒一种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把自己遗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神话传说融合在一起。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把神话传说中月的“广寒清虚之府”

具象化。入世不易，出世尤难。言外之意是说在现实社会中仍得好自为之。寄寓着作者入世与出世的双重矛盾心理。

苏门弟子李廌在这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虞美人令》说：“玉栏杆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青林枕上关山路，卧想乘鸾处。碧芙千里信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这首词通过雨中景色的描绘，寄托了离绪别情与翩然出世之想。词人凭栏眺望，风雨连江，远至天涯，千里一片。初夏时节有此“好风好雨”，词人感觉到爽朗畅快，心旷神怡。雨中的“岸花汀草”，更富有勃勃生机。风雨绵延，不禁牵引出词人的“千里思悠悠”。今夜天凉气爽，正好入眠，睡梦中可以凭借“霎时凉梦”到达所思的“南州”。思念远人是传统歌词所经常抒发的一种情感，李廌则以如此开阔清爽的景物作为背景衬托，思绪悠悠而又不低沉压抑，与苏轼词气质相似。

到了南宋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便有更多的词人滋生了“隐逸”、“出世”的思想意识。比如朱敦儒的《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有命。幸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而平生以功业自负的辛弃疾，其词中也屡见这种心态。如《南歌子》：“玄入参同契，禅依不二门。静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病笑春先老，闲怜懒是真。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闲。”《临江仙》：“锺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

欣赏宋词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宋词中还有大量的精美的艺术部件等待我们加强理解和认识。以上种种宋词篇章所表露出来的士人心情，可以说在宋词中，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封建文人的典型心态之一。

< 參考文獻 >

- 王兆鵬, 《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1
张晶, <文人心态的诗学维度>, 《湖南社会科学》2001.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
王萌, <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 《中州学刊》2003.2
龙建国, 《唐宋词艺术精神》(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2
杨海明, 《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1.3
臧维熙, 《宋词名篇赏析》(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2
朱瑞熙, 《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 1983.12
胡云翼, 《宋词选》(中华书局), 1962
李剑亮, 《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刘扬忠, 《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莫砺锋·童强, 《绝妙好辞——情韵并美的宋词》(辽海出版社), 2001.1

< 국문초록 >

중국 봉건사회 士人の 심리상태 문제를 연구하면 더욱 깊이 있게 중국 고전문학의 심층적 의의를 발굴할 수 있다. 본고는 宋詞에 나타난 士人の 심리상태를 통하여 宋詞의 심층적 의의를 찾고자 하는데, 필자는 이 사인의 심리상태를 ‘憂患心態’, ‘求知之難和感相知之切’, ‘出世心理’ 등 세 방면으로 나누어 살펴보았다.

주제어: 封建士人, 文人心態, 憂患, 出世心理